

25
1992-2017

中国社会形势研究25年

MAIN REPORTS FROM
BLUE BOOK OF CHINA SOCIETY, 1992-2017

主编 / 李培林

副主编 / 陈光金 赵克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形势研究25年

MAIN REPORTS FROM
BLUE BOOK OF CHINA SOCIETY, 1992-2017

主 编 / 李培林
副主编 / 陈光金 赵克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形势研究 25 年 / 李培林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201 - 0955 - 0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社会分析 - 中国 -
1993 - 2016 ②社会预测 - 中国 - 1993 - 2016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6165 号

中国社会形势研究 25 年

主 编 / 李培林

副 主 编 / 陈光金 赵克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谢蕊芬

责 任 编 辑 / 胡 亮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学编辑部 (010) 59367159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0.5 字 数：483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955 - 0

定 价 / 1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目 录



| | |
|-------------------------------------|-----------|
| 中国社会形势研究 25 年记述 | 李培林 / 001 |
| 记录改革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发展：1992 ~ 2016 年 | |
| ——基于《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的词频 | |
| 分析 | 范雷 / 017 |
| 数读社会蓝皮书：1998 ~ 2017 | |
| 谢曙光 吴丹 / 031 | |
| 1992 ~ 199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
| 048 | |
| 1993 ~ 1994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
| 068 | |
| 1994 ~ 1995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
| 080 | |
| 1995 ~ 1996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
| 097 | |
| 1996 ~ 1997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
| 108 | |
| 1997 ~ 1998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
| 121 | |
| 1998 ~ 1999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
| 136 | |
|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 | |
| ——1999 ~ 200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152 |
| 中国在改革开放新阶段的选择 | |
| ——2000 ~ 2001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166 |
| 社会发展进程步入全新的开放阶段 | |
| ——2001 ~ 200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186 |



开创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 | |
|-----------------------------|-----|
| ——2002~200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205 |
| 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 | |
| ——2003~2004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217 |
| 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 | |
| ——2004~2005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230 |
| 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 |
| ——2005~2006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249 |
| 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新阶段 | |
| ——2006~2007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265 |
| 中国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 |
| ——2007~2008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282 |
| 力挽狂澜：中国社会发展迎接新挑战 | |
| ——2008~2009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 297 |
| 中国进入发展的新成长阶段 | |
| ——2009~201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311 |
| 新成长阶段的中国社会建设 | |
| ——2010~2011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326 |
| 城市化引领中国新成长阶段 | |
| ——2011~201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341 |
| 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 |
| ——2012~201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358 |
|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创新社会治理 | |
| ——2013~2014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374 |
| 中国社会朝着更加注重质量提升的导向迈进 | |
| ——2014~2015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385 |
| 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 |
| ——2015~2016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402 |

目 录

| | |
|---|-----|
|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建设现代橄榄形社会 ——2016～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421 |
| 附录 25年社会蓝皮书总目录 | 441 |
| 后 记 | 480 |

中国社会形势研究25年记述

李培林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又称“社会蓝皮书”）自1993年出版第1本，到2016年出版第25本，走过了整整25年的时间，最早参与这项研究的课题组主要成员，有的调离，有的退休，有的已经去世。我成为25年来唯一始终实际负责和参与这项课题的人，感到有责任对这项长达25年的连续滚动课题进行总结，以有利于这项课题持续下去和更上一层楼。

一 什么是社会形势？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总理基金的支持下，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研究员主持、数量经济和技术研究所所长李京文研究员实际负责，开始进行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并于1991年出版了《199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该书获得极大成功，以课题组名义撰写的总报告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在这一背景下，次年，当时主管社会政法学科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流教授，提出由社会学研究所牵头，由当时的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教授实际主持，组成“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核心组成员有我、方明、黄平、陆建华，还有负责课题辅助工作的胡刚，我成为核心组的负责人。记得当时一开始我们是从“什么是社会形势”开始讨论的。那时科研经费还比较紧张，我们核心组几个人住在社科院建国门大楼北侧的四川驻京办事处招待所，彻夜讨论。因为招待所当时没有早餐，我们的早餐就在周边几条胡同的早餐摊上解决。

究竟什么是“社会形势”，我们当时查阅了很多文献，都没有找到确切



的说法。国外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人在使用“社会形势”的概念进行学术研究，国内的文献中，有“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国际形势”“军事形势”等说法，但也唯独没有“社会形势”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把“社会形势”拆分开，讨论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形势”。对“社会”的理解比较好办，我们几个都是学社会学的，知道“社会”的含义有大小之分，可以是“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化社会”那样的包罗万象的“大社会”，也可以是相对于“经济”而言的“中社会”，也可以是排除经济、政治、文化后的“小社会”。所以，我们把分析的基本范围限定在“中社会”，但又主张要与经济相联系，因为我们认为社会形势的判断要以经济形势为基础。对于什么是“形势”，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形态”和“趋势”，由此可以把“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理解为社会变迁发展的现状分析和趋势预测。第一本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一开始就给“社会形势”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认为“社会形势是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系统运行状况的综合性表现”。

好在当时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基础，陆学艺教授和我于 1990 年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这是我国第一本社会发展报告，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该书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写作这本书有两个背景，一是早在 1982 年底，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通过“六五计划”时，把“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正式改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的理念，但什么是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描述和分析体系是什么，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才开始得到认真研究；二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发表“人类发展报告”，用人类发展指数替代人均 GDP 对各国的发展水平进行排序，这促使人们思考更加全面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希望社会学的研究能够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所以仿照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组织撰写了《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我是这本书的总报告撰稿人，当然撰写的思路是课题组很多人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养鱼场里侃了几天侃出来的。该报告用“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作为总判断和理论框架，用大量的资料和数据从六大方面分析和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变，即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

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报告最后提出“全面推进社会改革”的方案，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

我们那时认为社会发展报告是一种中长期的分析和预测，而社会形势是一种年度的分析和预测，应当更容易一些。但后来才感到，这种看法是有偏差的。

二 社会形势的预测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蓝皮书比社会蓝皮书早出版一年，经济形势的预测采用了预测模型，每年公布下一年度的 20 个左右主要经济指标的预测数据。这个预测模型其实是假设经济的主要指标之间具有相关性，在一定的参数之下，指标可以呈现外推的线性变化。但实际上，由于模型的预测结果往往与现实的可能性并不相符，所以也要根据经验对结果进行人为调整。

社会蓝皮书一开始也想仿照这样的做法建立预测模型，预测下一年度的一些主要社会指标，如居民收入、城镇化率、失业率、犯罪率、基尼系数等。但后来发现，这样做的风险太大。我们曾去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与做经济预测研究的人员座谈，绝大多数人认为，这种短期的系统性的指标预测，准确率不会超过 20%，特别是对于社会形势来说，更是如此。

社会科学的预测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自然科学的预测模型几乎是封闭的，变量都是确定的，比如你可以根据推动力、空气阻力、摩擦力和抛物线轨迹测算出弹道导弹的运行轨迹，并进行拦截。社会科学的预测模型都是开放的，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全部的影响因素，而一旦一个新的影响因素加入，原有模型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全改变了。社会形势比经济形势的影响因素要更加复杂，比如说你预测社会政策突然变化的影响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其实严格地说与算命和掷色子没有太大区别。

那么是不是说社会形势预测没有规律可循呢？那也不是。翻阅这 25 年的预测结果，绝大多数还是比较靠谱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特殊的不可预测的影响因素，多数指标的变化是稳定的。比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速度，几十年中都是以每年 1 个点的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增长和变化情况相当稳



定；再比如我们测算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最重要的是受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和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就可以解释整个收入差距的约 60%，那么一旦城乡和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情况，就可以据此推论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开始出现逆转。当然，在社会形势方面，一些与政府政绩挂钩密切的社会指标，比如说犯罪率变化，往往很难找到稳定的变化规律。

我们经常讨论经济形势与社会形势的关系。一开始我们认为，经济形势是社会形势的基础，经济形势不好，社会形势也不会好。后来我们发现，即便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社会形势也未必好。再后来我们发现，即便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社会形势也不必然会恶化。也就是说，经济形势与社会形势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密切的相关关系。一般人判断经济形势，主要是根据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并不会对社会形势产生直接影响，经济形势要通过就业、物价、居民收入等一些中介指标的变化对社会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大规模征地拆迁，反而会引发一系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从而对社会形势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对于影响社会形势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一般也会归纳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并根据转轨与转型的力度和速度，来判断某一类社会问题阶段性的集中程度。

总之，尽管经过了 25 年的探索，但我们对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影响因素，还不能说达到把握规律的程度，很多情况下还是凭借多年的经验进行判断，要想使社会形势的预测成为一门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社会形势的分析框架

这次我们收集了社会蓝皮书 25 年的目录，目录的变化，实际反映的是我们关于社会形势分析框架的变化。

经济形势的分析框架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有国民经济的计划，政府的经济综合部门也有对经济体系的细致划分。但政府从来没有负责社会领域的综合部门，社会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也不明确，

不仅在中国不明确，在国际上也不明确。

社会蓝皮书一开始的时候，涵盖的领域很广，甚至包括了政治、法治、宗教、民族等。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推进，也为了使社会形势的分析和预测更加聚焦于一些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的核心领域，各研究分报告也不断收缩范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形势分析框架，包括人民生活、城镇化进程、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社会安全等。这就是社会蓝皮书分报告的主体部分，即“发展篇”。

每年都有一些公众关注的难点、热点、焦点问题，为了回应公众的关切，社会蓝皮书每年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推出一些关于社会难点、热点、焦点问题的专题报告，形成一个“专题篇”。

为了显示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蓝皮书都专门设置了一个“阶层篇”，反映各个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发展变化情况，如工人、农民、干部、私有企业主、青年、妇女等。但这个部分的一些报告，有时让人感到与社会形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后来就被合并掉了。

社会蓝皮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调查篇”，每年都要发表一些全国的大规模的社会综合调查结果和专题调查结果。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统计数据比较完善，社会统计是改革开放后才发展起来的，社会统计数据相对缺乏。为了使社会形势的分析和预测能够有扎实的数据支持，社会蓝皮书一开始就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部分，并坚持下来。

四 25 年社会发展趋势的几个阶段性判断

为了撰写这个记述，我重新认真研读了 25 年来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感到这些总报告在一些历史节点上所做的阶段性判断，还是很有前瞻性的，至今读起来仍然回味良久。

（一）关于 1992 年社会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判断

《1992~199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是第 1 本社会蓝皮书，那时刚刚发表了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记得当时为了准备这篇总报告，我和方明专门去广东省的深圳、东莞、顺德等地进行了十多天的调研，对当时发生的快速而重大的变化印象极为深刻，但同时也对一些过热的现象感到担忧，这些调研都对总报告的判断产生影响。当年的总报告提出，“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和“社会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并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转折性变化的特点，即社会主导价值发生变化；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发生变化；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对外开放迈出了新步伐；社会变革的程序和社会参与方式发生变化；社会精神面貌和社会心态发生变化。该报告也清醒地提出警告：基建投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债券热和办公公司热成为 1992 年中国经济的五大热点，从主流上看，这些“热”是积极合理的，但是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过大、银行贷款增长速度过猛、货币超发问题严重、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日趋紧张、价格涨幅度较大、交通运输全面吃紧、工业品继续积压等情况看，这些“热”中显然存在某种盲目性和不合理因素。据统计，1992 年全国各地乡以上单位计划建立开发区 8700 多个，如果全部投入开发的话，约需资金 30000 亿元。

这篇总报告关于社会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以及对过热经济现象的严厉口气，引起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而到 2014 年，1~9 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增长 20.9%，居民消费价格同期上涨 23.3%，零售物价上涨率大大超过 1988 年的 18.7% 和 1989 年的 17.8% 以及 15% 的严重通胀警戒线。

（二）关于中国发展进入人均 GDP1000~3000 美元的关键时期的判断

2005 年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提出一个大的判断，认为中国发展进入人均 GDP1000~3000 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时期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是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该报告还认为，国际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如今人均 GDP 已达到 1 万~2 万美元，而另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

地区至令人均 GDP 还停留在不足 3000 美元的水平，这是中国应当引以为戒的。

这篇总报告还特别强调，由于人口众多、受新的全球化影响等一些特殊因素，中国在进入人均 GDP1000 美元的关键时期之后，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特殊国情。第一，在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之后，中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还如此众多，要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问题和降低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第二，中国在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第三，中国在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具有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得到根本缓解。第四，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中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人口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第五，中国在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以后，农村按国际贫困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 1 美元，约折合 2.5 元人民币）还有 1 亿多贫困人口，这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第六，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应当高度关注民主意识的成长，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该报告还提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兴起与小国的兴起的国际影响完全不同，以往的发展经验说明，大国的兴起和更替往往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并可能引发势力范围争夺的国际冲突。中国在目前快速提高国际经济社会地位的时候，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争取较好的国际环境。

关于人均 GDP1000 ~ 3000 美元关键发展阶段的判断，被广泛引用，但也有一些争议和质疑。但现在看来，它很类似于一种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设和判断。

（三）关于中国发展进入新成长阶段的判断

2010 年的社会蓝皮书总报告，以“中国进入发展的新成长阶段”为题，指出我国将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而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居民消费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开始进入国际金融



危机后的新成长阶段。这篇总报告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新成长阶段的特征，即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中期加速的新成长阶段；社会结构变迁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成长阶段；人民生活进入大众消费的新成长阶段；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的新成长阶段；社会保障进入构建覆盖全民体系的新成长阶段；改革从主要是经济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新成长阶段。

该总报告强调，这个新成长阶段呈现的一些新特征，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推动力，与过去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将更加依赖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内消费增长。并且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深化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新成长阶段的主要任务。

应当说，我们比较早地感觉到，在 2010 年前后，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改革开放前 30 年所面对的主要发展问题和挑战与之后的后 30 年相比，有了重大的差别。后来，我在 2015 年社会蓝皮书中，以“‘新常态’背景下的新成长阶段”为题写了一篇代序，重新强调了这个判断，认为从近两年发展的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趋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该文以一些关键性的数据表明，我国发展出现六个方面的阶段转折，即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

这些关于新成长阶段的研究和判断，可以说从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诠释了经济新常态作为一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背景以及我们面对的新的战略选择。

五 社会形势判断中几个引起争议的问题

在 25 年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过程中，也不断出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有时我作为这项课题的实际负责人，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所以说，这项课题研究能够坚持 25 年，也的确不容易。这里，我记述几个印象深刻的例子。

（一）关于“社会转型”的提法

在写作第一本社会蓝皮书总报告时，就讨论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还是选用了我们当时出版不久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的分析框架，即“社会转型”。但这个概念，当时媒体和官方文件都还很少使用，在含义的理解上似乎也有些敏感，因为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刚刚发生政治巨变，人们对“转型”的概念抱有警觉。当时在讨论中，社会蓝皮书的主编之一江流教授就提出一种担心，“人们会不会有疑问，社会转型是往哪里转呢”？另一位主编陆学艺教授和我，则认为“社会转型”的概念有力度，很难找到其他的概念来分析和描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变化。经过多次讨论，江流教授拍板，同意使用“社会转型”作为核心概念。第一本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专门写了一段话来定义“社会转型”：“从 1978 年肇始的改革开放，将中国推上了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化的轨道。十几年来改革开放成果的积累和巩固，使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结构正处在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

“社会转型”后来成为学界普遍使用的分析概念，但伴随它的争议和讨论一直存在。对于这篇总报告中关于社会转型的定义，我后来概括为两个巨变的同步进行，即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

（二）关于“城镇调查失业率”的使用

2008~2009 年的总报告，用了一个很响亮、也很有力度的名字——《力挽狂澜：中国社会发展迎接新挑战》。2008 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当时中国社会各界都在进行改革开放 30 年的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新起点。很多人期待，2008 年在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就像 1964 年的东京奥运会和 1988 年的汉城（首尔）奥运会一样，成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国内发生了汶川地震灾害，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快速反应，国际上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下，2008 年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增速明显放缓，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运行困难，我们派出的几个调查组，都感到就业形势急剧恶化，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比较突出。那时，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 2008 年 1~9 月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 多一点，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统计城镇户籍非农从业人员的失业情况，并不覆盖一些未登记的失业或农民工失业，因而失去了准确反映我国就业形势的灵敏度，十几年中每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都是 4% 略多一点，而这个时期的就业形势有很大波动。

课题组在讨论中，为使用什么指标反映 2008 年就业形势的恶化而苦恼。恰好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第二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最后就决定用这个调查的数据来测算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是各国监测就业情况时普遍使用的指标，国家统计局也已经探索多年，但因为统计还不完善，一直也没有公布。

我们那一年的总报告，在分析就业形势时指出：“从 2008 年全年来看，就业面临五方面压力：一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需要就业的青年达到历史新高；二是自然灾害（雪灾、震灾、水灾）造成一批企业停产、停业和个体工商户歇业；三是一批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因经营困难倒闭；四是为节能减排关闭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五是 2008 年是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总报告还强调，“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批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和破产倒闭，农民工歇业、失业和返乡现象比较突出。根据对广东部分企业的调查，企业减员一般达到了 20%。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08 年 5~7 份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 9.6%”。就是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 9.6%”的表述，因为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差异很大，引起高度关注。而一些并不知道“调查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差别的媒体，则对此广泛报道，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

在当年一次讨论就业的高层会议上，也有重要领导询问，到底政府部门公布的失业率准确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准确。领导的询问给有关政府部门造成很大压力，好几个部门都来找我询问和沟通，并且详细检查我们全国大调查的抽样方案和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测算方法，我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有人授意我通过媒体采访，说明两个失业率的差别，以便消

除某些误解。最后，我没有同意主动接受记者采访的建议，担心媒体会进行非学术性的新一轮炒作。我只同意就这个问题写一个内部的报告，并进行详细的说明。

在我们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之后几个月，2009年2月2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受金融危机影响，目前因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达到两千万人，并预测2009年就业形势会十分严峻。据我了解，“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达到两千万人”的数据，是根据农业部300多个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推算出来的，这与我们的数据反映的情况大体吻合，关于我们擅自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一事，也因此不了了之。这次小风波和我写的关于建议使用调查失业率的内部报告，后来还是发挥了作用，近几年我国已经开始公布和使用大中城市的调查失业率。

（三）关于“幸福感”和“政府满意度”

社会形势分析有一个很独特的方面，就是它不仅仅根据客观指标的分析来反映现实层面的变化，也注重根据主观指标来反映社会心态的变化。“社会心态”这个词在我国目前已经用得很广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理研究室还把“社会心态”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并给“社会心态”下了一个定义：“社会心态是人们对自身及现实社会所持有的较普遍的社会态度、情绪情感体验及意向等心理状态。”这个反映社会心理变化态势的概念，在英文中其实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概念，相近的有 social psychology、social mentality、social attitudes 等，但都很难准确传达中文的“社会心态”的含义。

社会心态实际上是判断社会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常言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很多情况下，人心向背都会成为社会形势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随着中国的社会巨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更加关注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相对剥夺感、获得感等，都成为了解社会形势的重要指标。但主观指标的变化，有其特殊的规律，往往与人们的常识判断有很大的不同。社会蓝皮书对社会主观指标调查数据的公布，也经常引起热议和受到非议。

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即“近八成居民感到生